香港亞太研究所 • 研究叢刊第九十八號

一衣帶水：台港社會議題縱橫
Near Neighbours: Issu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Societies

編　　者：趙永佳、蕭新煌、尹寶珊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　　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　　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　　次：二零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98-8

© 香港中文大學 2014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錄

編序 vii

第一部分：婚姻與家庭

1. 家務分工與香港的夫妻關係
丁國輝 3

2. 香港「八十後」全職青年的工作與家庭平衡：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啟示
劉玉琼、馬麗莊、尹寶珊 21

第二部分：社會問題

3. 老年年齡的社會建構與想像
楊文山、李怡芳 51

4. 大學學位擴張與教育機會不平等：香港的情況，2001–2011
葉仲茵 79

5. 兩代毒品兩代人：香港藥物濫用的新挑戰
張越華 109

第三部分：政治態度與價值

6. 社會接觸對社會行動者的潛在結構性影響：
以擁核或反核態度為例
張碩庭、吳齊殷 123

7. 香港年輕人對社會公共政策的態度：
階層、世代與態度變遷
李鯉、趙永佳 149

8. 台灣的民主轉型與世代政治：1995–2010
林宗弘 171

第四部分：中國關係與效應

9. 兩岸政策的社會支持基礎：
中國效應與台灣新興社會分歧
陳志柔 217

10. 香港與內地融合的進程和嬗變：
以「自由行」政策為例
鄭宏泰、尹寶珊 237

11. 評估「中國關係」：
比較台灣與香港的民意
蕭新煌、尹寶珊 277

編者、作者簡介 321

索引 323

9 兩岸政策的社會支持基礎
中國效應與台灣新興社會分歧

陳志柔

引言：問題的緣起

本文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社會交往的態度傾向。具體而言，本文以「陸客來台觀光、陸生來台求學、陸人來台工作」為參考指標，呈現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大陸人士來台的態度，及分析影響民眾取態的可能肇因。近兩三年來，兩岸社會交往急速升溫，本文繼2010年相關議題的首次調查之後，再次檢視2012年的調查資料，進一步檢證民眾態度的趨勢，並確認相關影響因素及因果命題。在理論議題上，本文參考有關移民政策態度的研究文獻，分析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人民」這個外來群體，所呈現的接納及排斥態度，及影響其取態之成因。

兩岸互動的急速升溫，始於2008年台灣政黨輪替，並於2012年馬英九連任後，得到鞏固及按原定軌迹持續前進。2010年6月，《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正式簽署實施，兩岸經濟開放更超以往。2008年7月開放陸客團體來台觀光，2011年6月啟動陸客自由行（北京、上海、廈門三城市），2012年4月起，再分兩階段開放十個城市的大陸居民來台

自由行。與此同時，文教與社會交流也急速擴張。2010年8月，立法院完成《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簡稱陸生三法）修正案，逐步落實陸生來台就學及大陸學歷採認。除了長期停留、修讀正式學位的陸生以外，短期研習陸生、專業人士及商務人士等短期停留的大陸人士也急速增加。根據內政部統計，大陸地區人民短期停留入境人次的數目，從2010年的151萬人次增至2011年的165萬人次，到2013年已達276萬人次（其中169萬人次為觀光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2014）。

也就是說，兩岸人民接觸與互動的場域，已經從中國大陸擴展到台灣寶島。以往兩岸互動是台灣人到大陸，現在及未來則包括大陸人來台灣。2010年時，ECFA、陸客、陸生等議題，在媒體熱論、國會熱議的喧囂擾攘中，國民黨憑藉執政優勢，完全主導了政策走向，相關法規陸續付諸實施，兩岸社會互動進入了制度化的階段。當時，針對這些兩岸社會交往的議題，我們曾經利用相關調查資料，分析影響台灣民眾贊成或反對相關政策的態度（陳志柔, 2011）。兩年之後的2012年，雖然兩岸互動的架構已定，但相關政策仍不時浮現爭議；雖然開放，但開放的節奏和幅度，仍有很大的變動空間。民眾大多贊成兩岸社會交往、相互開放，但開放到甚麼地步呢？是繼續開放，邁向水乳交融？還是加強管理，審慎保持距離？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政策議題的態度，可能會隨着時空環境改變而產生變化。一次性的調查結果，未必可靠；仍需多次系統性調查的驗證，方能確定民心走向及影響因素。由是之故，本文以最近的2012年調查資料，再次檢視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社會交往的態度傾向及其影響成因。

2010年的調查進行時，正處於政策討論與形成階段，當時我們詢問受訪者「贊不贊成」各類兩岸互動交流的政策，包括ECFA、承認大陸學歷、開放陸生來台、開放陸客自由行及增加觀光人數。2012年3月進行調查時，由於相關政策已經實施，我們改以「陸客來台觀光、陸生來台求學、陸人來台工作」為焦點，詢問受訪者認為這三類大陸人士的人數，可以「增加、減少或維持現狀」？

藉由「陸客、陸生、陸人來台作不同活動」的議題，可以反映台灣的社會分歧，以及這些社會分歧對兩岸政策的差異態度。不同群體（性別、階級、政黨支持者）之間對特定政策的傾向，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該如何解釋？這些差異的形成和後果，不僅代表台灣社會的多元和異質性，也呈現了中國崛起和兩岸關係劇變下，對台灣產生的社會效應。當前兩岸政策正處於制度化的起始階段，它們尤其具有制度鎖定（lock in）的效果，會影響往後的制度路徑和政策迴轉空間，它們不是單次或個別性的政策，而是影響深遠的制度配置和行為模式，因此，這些政策的社會支持基礎，更值得分析與探究。

相關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2010年時，針對這些兩岸社會交往的議題，我們已經分析了影響台灣民眾贊成或反對相關政策的態度（陳志柔, 2011）。當時，調查資料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政策的態度，隨着議題不同而有明顯的態度差異。民意相對較支持ECFA及陸生來台，分別有45%（vs. 32%）及50%（vs. 45%）贊成；支持承認大陸學歷及陸客自由行的民眾則相對較少，分別是44%（vs. 50%）及43%（vs. 4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ECFA以外，對於上述社會交往的議題，民眾贊成與反對的差距僅為5個百分點左右，顯示這些議題在台灣社會並沒有達成共識，贊成或反對都不是一面倒的絕對多數。若外在政經環境發生變化，民眾集體態度就可能會隨之改變。

2010年的調查研究也顯示，當其他條件相若，男性、年長者、社經地位高，及泛藍支持者，對兩岸政策多傾向贊成；但女性、中青年、社經地位低，及非泛藍支持者，則對跟中國作進一步經貿及社會交往，相對較為保留。雖然政黨認同、統獨認同顯著影響了民眾的兩岸政策態度，但控制了政黨認同及統獨認同之後，性別、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對於民眾的兩岸

政策態度，仍存在顯著的影響力。本文將分析這些因素的影響力是否持續存在，並加入職業變項，測量階級的影響力是否存在。

關於兩岸社會交往的態度趨勢，回顧社會學相關領域的理論觀點及概念架構，最能提供參考架構的是關於移民政策態度，以及對外國人或外來群體態度的研究文獻。這方面的文獻可粗分為兩類，最大塊的研究文獻，聚焦於探討哪些個人特質（人口、社會、經濟、社會心理等特質）影響了對少數群體的待遇態度差別。例如，社會地位低及經濟狀況較差者，較有可能受到少數群體入侵的威脅，所以他們傾向於不歡迎外來群體（Espenshade and Hempstead, 1996; Semyonov et al., 2002; Raijman et al., 2003）。反外國人情結（anti-foreigner sentiment）亦伴隨着某些個人特質而升溫：男性、年紀大、教育程度低、失業者，及右派者（Semyonov et al., 2006）較多有排外傾向。此外，跨國比較研究顯示，對於外來群體的待遇態度差別，源於個人和結構層次的因素，例如外來群體的規模和本國經濟狀況，代表他們帶來的威脅及與本國人的競爭，都會影響本國人民對他們的接納程度（Quillian, 1995; Kunovich, 2004）。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從1895年起受日本人殖民統治，1949年起經歷外省人進入台灣的歷史，到1990年代開始接觸東南亞勞工、東南亞及大陸配偶，不乏與外國人接觸的經驗。近幾年，陸續有學者研究台灣民眾對婚姻移民（伊慶春、章英華, 2006; 蔡明璋, 2011），及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陳志柔、于德林, 2005）。陳志柔、于德林（2005）發現：族群和國家認同，顯著影響了台灣民眾對於大陸配偶和東南亞配偶取得公民權的態度；政黨支持和族群成見影響了給予大陸配偶公民權的態度，但卻沒有影響給予東南亞配偶公民權的態度。也就是說，影響民眾對於外來配偶移民政策態度傾向的，並不是階級利益或與異族接觸經驗，而是政黨動員與政治論述。

資料與變項

本文資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2中國效應基本指標研究」電話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20歲及以上之成年人。調查日期是2012年2月20至27日，共計完成1,202份成功訪問樣本。[1] 本文的依變項，源自該次電話訪談中的三道題目，分別詢問受訪者對於以下三種中國大陸人士來台的人數，是應該「增加、減少或維持現狀」：

一、對於政府目前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團及自由行的人數；

二、對於政府目前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台灣就讀大學的人數；

三、對於政府目前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2]

表1及圖1呈現台灣民眾對上述議題的態度分布。對於「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團及自由行的人數」而言，認為應該「增加、維持現狀、減少」的比例依次為43%、40%、12%；對於「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台灣就讀大學的人數」而言，認為應該「增加、維持現狀、減少」的比例依次為28%、40%、24%；對於「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而言，認為應該「增加、維持現狀、減少」的比例依次為9%、42%、43%。綜

1. 該次調查委託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共接觸24,939個電話號碼，成功訪問1,202個有效樣本。參酌AAPOR之定義，調查之訪問成功率（cooperation rate）為57.46%、拒訪率（refusal rate）為2.25%、接觸率（contact rate）為11.52%，平均訪問時間為18.07分鐘。為使樣本更具代表性，本文分析採用加權處理過之樣本，針對樣本的性別、年齡（10歲組）、都市化程度（都會核心、工商市區、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低度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以及偏遠鄉鎮），以多變項反覆加權法（raking）的方式進行加權處理。經過加權後之資料與性別、年齡、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經卡方適合度檢定，檢定結果與母體資料一致。
2. 三道題目隨機輪替，沒有固定順序。

表1：民眾對於政府開放各類大陸人士來台人數的態度（%）

	陸客來台觀光	陸生來台求學	陸人來台工作
增加	43	28	9
維持現狀	40	40	42
減少	12	24	43
遺失值	5	8	6

注：N=1,202。遺失值包括回答沒有意見、很難說、不知道和拒答。

表2：「對大陸人士來台接受程度」的變項數值分布（%）

	陸客來台觀光	陸生來台求學	陸人來台工作
維持現狀/減少	53	71	91
增加	47	29	9

注：N=854。

合觀之，台灣民眾對於這三類大陸人士，呈現層次分明的差序格局態度。陸客來台觀光最受台灣民眾歡迎，僅有12%認為應該減少；對於陸生來台求學，認為應該增加和減少的比例差不多（28%和24%）；但對於陸人來台工作，則僅有9%認為應該增加。由圖1及圖2的折線圖和直條圖，更清楚顯示了這三個議題的層次性。

我們利用上述三道題目—陸客來台觀光、陸生來台求學、陸人來台工作，分別探討受訪者對於這三類大陸人士來台人數的態度差異。上述的每一道題目，按照回答的傾向，皆分成兩類：「維持現狀或減少者」（給0分）與「增加者」（給1分）。從表2的次數分配可以看出，對於「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團及自由行的人數」而言，認為應該「維持現狀或減少人數」與「增加人數」者相當接近，各為53%和47%。再看「開放中國大陸學生來台灣就讀大學的人數」，回答「維持現狀或減少

圖1：民眾對於政府開放各類大陸人士來台人數的態度折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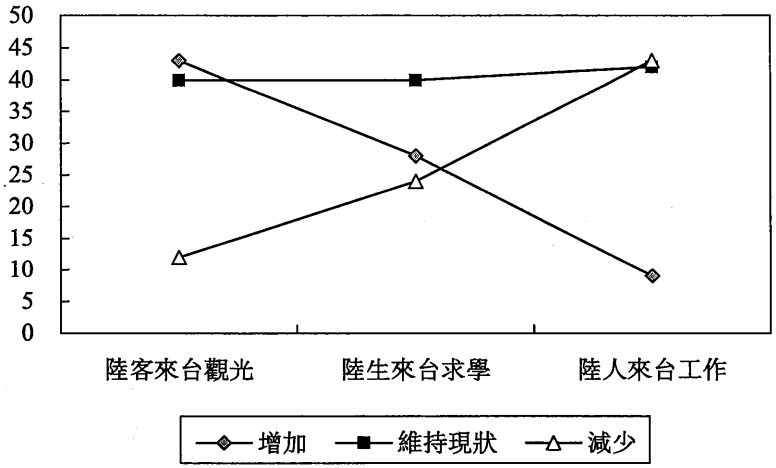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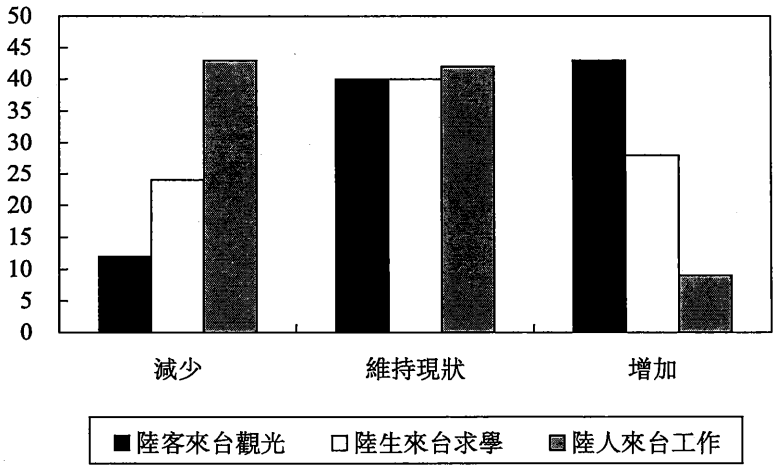


圖2：民眾對於政府開放各類大陸人士來台人數的態度直條圖（%）



人數」者有71%，明顯多於「增加人數」者的29%。最後，談到「開放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回答「維持現狀或減少人數」者與「增加人數」者的差異更是明顯，前者為91%，後者僅9%。

本文納入分析的其他自變項包括：個人社會位置、社經地位、政黨支持，以及與中國社會的接觸經驗、兩岸交往對自身的就業及收入幫助。它們的定義和操作化如下：

一、個人社會位置：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等四項。年齡為受訪者接受訪問當年減去其自報出生年。族群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三個類別（台灣原住民因樣本數過少而剔除），測量操作上以受訪者父親的籍貫為指標。

二、社經地位：[3] 以個人月均收入、階級為指標。個人自答月均收入，有14個選擇區間，從最低的沒有收入到最高的月收入20萬元新台幣（下同）以上。階級分類以EGP（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階級劃分為基礎，採用Ganzeboom及Treiman（2003）的原則，將職業編碼經由與ISCO–88相對應的方式，轉換成EGP的9種分類（參閱Ganzeboom and Treiman, 2003:172）。最後為求化繁為簡，我們再分成三大類，包括藍領（含監工、技術勞工、半/非技術勞工和農業勞工）；白領（含文員、服務及銷售人員）；以及高級白領（含高階經理及專業人員、中低階經理及專業人員和自雇農民）。此外，又加上無工作者（含家庭主婦、幫忙家務與照顧家人），階級一項共分成四大類。

3. 就社經地位的影響而言，教育程度原本和依變項的相關性是顯著的，但當納入了階級或收入之後，教育程度的影響力就消失了，所以在後來的迴歸模型分析中，教育程度並沒有放入。另外所謂的「南部」因素，當控制了相關變項之後，對於民眾的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同樣的在後來的迴歸模型分析中，也沒有放入。

三、政黨支持：調查中詢問受訪者「請問在民進黨、國民黨和其他政黨中，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我們將選項合併為三類：泛藍（含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泛綠（含民進黨和台聯黨）和中間選民（含所有政黨都不支持、無政黨傾向者和其他）。

四、接觸經驗：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與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是相關文獻解釋對移民態度的主要視角之一。我們以三道題目，測量受訪者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接觸程度：「請問，去年一年裏（從1月到12月底），您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不含香港和澳門）？」、「在您認識的台灣人裏面，請問大約有多少人現在住在中國大陸？超過十個，還是不到十個？」和「請問過去三個月以來，您與住在中國大陸的親人或朋友（含台灣人和大陸人），平均每個月聯繫有沒有超過十次，還是不到十次（包括電話、電郵、網路……）？」以上三題，分為「有接觸經驗」及「完全無接觸經驗」兩類；後者即在上述三題都回答沒有者。

五、就業及收入幫助：民眾對於兩岸社會交往的態度，可能受到自身經濟利益的影響。我們以「擔不擔心失業」及「家庭收入影響」來測量這個因素。一是對個人就業保障的影響，題目為：「請問，最近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下，您會不會擔心失業？」我們將回答區分為兩類：「不擔心失業」（含不擔心和幾乎不擔心），及「擔心失業」（含非常擔心、擔心和普通）。

另外一題測量受訪者評估對家庭收入的影響，題目為：「請問，您認為目前為止，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的經濟狀況是有幫助，或是有負面影響？」我們亦將回答區分為兩類：「對家庭經濟有幫助」（包括幫助很大和有一些幫助），及「對家庭經濟無甚幫助」（含沒有影響、有一些負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很大）。

最後，將以上已分類的兩道題目，經交叉組合成四種情況，再合併成新變項「就業及收入幫助」，回答區分為兩類：「就業保障及經濟影響為非負面」，包括不擔心失業或對家

表3：變項的次數分配和統計值

	樣本數	百分比	均值	標準差
性別				
女性	429	50		
男性	425	50		
年齡	854		44.62	14.12
婚姻狀況				
已婚	628	74		
未婚	226	26		
族群				
閩南人	687	80		
客家人	66	8		
外省人	101	12		
個人月均收入	854		4.99	2.85
階級				
高級白領	314	37		
白領	214	25		
藍領	173	20		
無工作者	152	18		
政黨支持				
泛藍	313	37		
泛綠	169	20		
中間選民	372	44		
接觸經驗 (有=1，無=0)	854		0.73	0.44
就業及收入幫助 (非負面=1，負面=0)	854		0.54	0.50

庭經濟有幫助（含不擔心失業並對家庭經濟有幫助、不擔心失業但對家庭經濟無甚幫助，以及擔心失業但對家庭經濟有幫助），及「就業保障及經濟影響皆為負面」，即既擔心失業且對家庭經濟無甚幫助（表3）。

研究發現

影響台灣民眾贊成增加陸客來台觀光的因素

由表4–1的模型1可知，就個人社會位置而言，性別在模型中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1$），意指女性比男性較不贊成增加陸客人數。2010年的調查資料，也顯示同樣的性別差異；當其他條件相當，女性比男性更排斥兩岸的社會交往（陳志柔, 2011）。從族群看來，外省人較閩南人相對持贊成的態度。就社經地位的影響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階級的影響力，當其他條件相若時，高級白領和白領都比藍領更傾向贊成增加陸客人數（p皆$<.05$）。從政黨支持來說，泛綠以及中間選民（包括所有政黨都不支持、無政黨傾向者和其他）相較泛藍者，更為一致地不贊成增加陸客人數（p皆$<.001$）。在接觸經驗方面，與大陸社會有接觸經驗者，較贊成增加陸客人數（$p<.05$）。

表4–1模型2中，增加了「就業及收入幫助」的變項，由此呈現自我經濟利益考量的影響。不論男女，在最近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下，有就業安全感或感受到對家庭經濟的正面影響者，較贊成增加陸客人數（$p<.001$）。與表4–1模型1相較，加入自我經濟利益的考量後，除了階級的影響力徹底消失，其他變項的結果仍然一致，表示台灣民眾，不管屬於任何階級，只要有就業安全感或認為對家庭收入具正面影響者，就會傾向贊成增加陸客人數。

影響台灣民眾贊成增加陸生來台求學的因素

由表4–2模型1可知，就個人社會位置而言，性別在模型中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1$），意指女性比男性較不贊成增加陸生來台人數。就社經地位的影響而言，我們發現階級有顯著影響力；當其他條件相若，高級白領和白領都比藍領更傾向贊成增加陸生來台的人數（p皆$<.05$）。從政黨支持來看，泛綠和中間選民相較泛藍者，更為一致地不贊成增加陸生來台的

表4–1：民眾贊成增加陸客來台觀光的二元邏輯迴歸模型（*b*）

	模型1	模型2
女性 (男性)	–.558***	–.507**
年齡	.007	.011
未婚 (已婚)	–.328	–.304
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283	.294
外省人	.532*	.538*
個人月均收入	.042	.026
階級 (藍領)		
高級白領	.441*	.349
白領	.514*	.398
無工作者	–.056	–.103
政黨支持 (泛藍)		
泛綠	–1.612***	–1.415***
中間選民	–.705***	–.597***
接觸經驗	.437*	.431*
就業及收入幫助		.667***
截距	–.363	–.870
χ^2	136.924***	154.160***
自由度	12	13
樣本數	854	854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變項名稱括弧內為對照組。*b*為邏輯迴歸係數。
原始資料依照性別、年齡、都市化程度加權。

表4–2：民眾贊成增加陸生來台求學的二元邏輯迴歸模型（*b*）

	模型1	模型2
女性 (男性)	–.720***	–.660***
年齡	.004	.010
未婚 (已婚)	.029	.088
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152	.135
外省人	.362	.381
個人月均收入	.056	.029
階級 (藍領)		
高級白領	.580*	.447
白領	.512*	.323
無工作者	.179	.110
政黨支持 (泛藍)		
泛綠	–1.516***	–1.200***
中間選民	–.412*	–.229
接觸經驗	.525**	.536**
就業及收入幫助		1.157***
截距	–1.470**	–2.411***
χ^2	107.168***	148.116***
自由度	12	13
樣本數	854	854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變項名稱括弧內為對照組。*b*為邏輯迴歸係數。
原始資料依照性別、年齡、都市化程度加權。

人數（p皆<.05）。在接觸經驗方面，與大陸社會有接觸經驗者，較贊成增加陸生來台的人數（p<.01）。

表4–2模型2中，加入自我經濟利益考量的變項。不論男女，在最近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下，具就業安全感或認為對家庭經濟有幫助者，較贊成增加陸生來台的人數（p<.001）。與表4–2模型1相較，加入自我經濟利益的考量後，階級的影響力徹底消失，中間選民的影響亦弱化為不顯著，其他變項的結果仍然一致。這表示台灣民眾不管屬於任何階級，只要有就業安全感或認為對家庭收入正面影響者，就會傾向贊成增加陸生來台的人數。

影響台灣民眾贊成增加陸人來台工作的因素

由表4–3模型1可知，性別在模型中雖然未達一般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但仍顯示女性較男性傾向反對（達到p<.10的顯著水準）。就社經地位而言，階級的影響力仍然可見，當其他條件相若，高級白領比藍領更傾向贊成增加開放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p<.01）。從政黨支持來看，泛綠和中間選民相較泛藍者，更為一致地不贊成增加開放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p皆<.05）。

表4–3模型2加入了自我經濟利益考量的影響，它的影響力是顯著的。在最近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下，不擔心失業或認為對家庭經濟有幫助者，較贊成增加開放大陸人民來台灣工作的人數（p<.01）。與表4–3模型1相較，即使加入自我經濟利益的考量後，其他變項的結果仍然一致。

結論

上述2012年的調查結果，呈現了近兩年兩岸社會加速交流的民眾態度傾向。其中幾點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幾個關鍵變項的影響，即（一）性別、（二）政黨支持、（三）自我經濟利益考量（表5）。

當其他條件相若，對於各類大陸人士來台的規模，尤其

表4–3：民眾贊成增加陸人來台工作的二元邏輯迴歸模型（b）

	模型1	模型2
女性 (男性)	–.453+	–.414
年齡	–.013	–.010
未婚 (已婚)	–.090	–.059
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013	–.034
外省人	.414	.424
個人月均收入	.018	–.006
階級 (藍領)		
高級白領	1.074**	.970*
白領	.257	.102
無工作者	.446	.391
政黨支持 (泛藍)		
泛綠	–1.463**	–1.218*
中間選民	–.678*	–.546*
接觸經驗	.217	.216
就業及收入幫助		.894**
截距	–2.020**	–2.656***
χ^2	42.609***	51.659***
自由度	12	13
樣本數	854	854

+p<.10 *p<.05 **p<.01 ***p<.001

注：變項名稱括弧內為對照組。b為邏輯迴歸係數。
原始資料依照性別、年齡、都市化程度加權。

表5：影響台灣民眾對兩岸議題態度的變項分析

	增加陸客來台觀光		增加陸生來台求學		增加陸人來台工作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女性 (男性)	−	−	−	−		
年齡						
未婚 (已婚)						
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外省人	+	+				
個人月均收入						
階級 (藍領)						
高級白領	+		+		+	+
白領	+		+			
無工作者						
政黨支持 (泛藍)						
泛綠	−	−	−	−	−	−
中間選民	−	−	−		−	−
接觸經驗	+	+	+	+		
就業及收入幫助	不適用	+	不適用	+	不適用	+

是增加陸客和陸生人數方面，女性的態度較男性更傾向反對，顯示她們較不願意擴大與大陸人民的旅遊經濟和社會交流。在2010年的調查中，也呈現類似的性別差異，女性對於非經濟層面的兩岸政策（承認大陸學歷、陸生來台、陸客來台），亦比男性更傾向反對。但在經濟開放的ECFA議題上，並沒有存在性別差異（陳志柔, 2011）。如此顯著的性別差異，反映台灣女性對於政府的兩岸政策態度，存在跟男性不同的態度和思路。

就經濟開放和貿易往來而言，台灣女性和男性意見差異不大。但就非經濟層面的政策，女性卻比男性更不贊成與中國擴大交往。為甚麼？幾個可能的解釋是：（一）安定感的需求：增加陸客、開放陸生等議題，對很多人來說，是「社會接觸」的多樣化及「生活世界」的改變，但就女性而言，尤其家庭主婦和單身女性，以及重視穩定性與安全感的女性，急切及過度的兩岸社會互動，可能會令既有的「生活秩序」受到影響、干擾甚至被打亂，因而對之持保留的態度。而且，長久以來中國社會予人由大男人主宰的印象，讓台灣女性對於兩岸的社會交往存在更大的不信任。（二）家庭穩定的需求：多數女性不認為她們會在兩岸的社會交往深化中得意或獲益，反而可能失意又失利。過去20年，以男性為主的台商台幹們西進大陸，縱使賺錢給養台灣的妻兒，但妻子更重視的婚姻穩定和家庭美滿卻多被犧牲。這類兩岸分隔的家庭生活，雖然僅是少數家庭的生活經驗，但卻影響多數女性對於相關議題的態度傾向。（三）「小三」效應的威脅：藉由ECFA，台灣經濟即使發展，但發展成果多是男人享受；兩岸社會交往後的爛攤子，卻往往由女人來收拾。媒體時常報道「小三」話題，讓台灣女性對於兩岸社會交往抱持不信任的保留態度，甚至認為自己會成為其中潛在的受害者。（四）婚姻市場的影響：兩岸擴大社會交往後，引入了新成員進入台灣的婚姻市場，未婚女性可能感受到中國大陸女性的跨海競爭，家庭主婦可能想像到她們的年輕子女會跨海擇偶，對兩岸社會交往反而有所保留。可能因為上述因素，所以不論藍綠、社經地位、世代，對於兩岸的社會深化交往，台灣女性比男性傾向保留。

上述有關性別差異的解釋，是從台灣現實社會脈絡出發，在理論層次上，相關文獻也曾解釋性別在政黨認同、投票行為、政治態度上的差異性，值得參考。例如，關於美國政策議題的性別差距解釋，在1976至1992年期間，女性較男性更關注社會福利議題，男性則較女性更關注經濟議題（Thorson and Stambough, 1994），而男女在議題排序的差異上，比在議題態度的差異，對於投票行為更有影響（楊婉瑩, 2006）。再以美國

2004年的總統選舉為例，由於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戰爭的關係，南方選民在傳統上的男女議題差異大幅減少，但可能考慮到未來伊拉克戰爭的結束及恐怖分子威脅減低，以往男女在議題順序上的差異又會重新明顯化（Kaufmann, 2006）。是以，由國際及台灣的政黨認同研究看來，性別差異會呈現男女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差異，也會影響後續的政黨認同或選舉行為（Norris, 2003; 楊婉瑩、劉嘉薇, 2009）

在本文中，性別的影響力亦呈現世代的差異，各別來看，年輕世代的女性，對於文教交流（開放陸生來台求學）的政策，相對年輕男性而言，態度較為保留，傾向反對；而年長世代的女性，對於社會交往（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的相關議題，相對而言亦比年長男性傾向反對。這似乎反映了上段的假設：女性不認為她們會在兩岸的社會深化交往中得意或獲益，甚或可能失意又失利。由於年長的世代，相較於年輕世代的女性，覺得受害更深，所以更為反對。

政黨支持對於兩岸政策的影響，表面上看來符合台灣「凡事政治化」的日常經驗：泛綠支持者（相對於泛藍）反對各項對中政策的傾向強烈。但值得注意的是，泛綠加上泛藍並非等於全體台灣民眾，二者（泛藍37%；泛綠20%）共只佔台灣民眾的57%，餘下的44%（沒有固定強烈政黨認同者）的態度傾向又如何呢？大體而言，另一半選民的態度傾向，恰恰處於泛藍和泛綠之間。當其他個人背景因素（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族群、收入、階級）和接觸經驗相若時，這群所謂的「中間選民」（非藍非綠者），相對於泛藍，傾向不贊成擴大交往（增加陸客、陸生及陸人人數）。政黨認同的確顯著地影響了台灣民眾的兩岸政策取態。

最後，兩岸經濟發展對於個人自身經濟利益的影響，會顯著影響民眾接納各類大陸人士的態度。當其他條件相若時，在兩岸經貿交往中受益者，會傾向認為應該擴大各類大陸人士來台數目；若認為兩岸經濟交往對於個人會不利者，如影響就業安全感且無助家庭經濟者，則會傾向反對擴大陸客、陸生及陸人來台。由此看來，當其他條件相若，「學甲虱目魚」效應，對於民眾仍有影響潛力。

本文初步呈現了兩岸社會交流政策的社會支持基礎。在台灣，關於政治討論和政策議題，往往受到政黨傾向的絕對影響，所謂「過度政治化」或「屁股決定腦袋」（政黨認同決定了議題取態）是常見的現象。但以兩岸社會交流而言（陸客、陸生、陸人來台），除了政黨認同外，性別也多顯示了獨立的顯著影響力。台灣的社會分歧，至少在兩岸議題上，除了統獨和藍綠的舊軸線以外，性別和經濟上的自身經濟利益計算是新興的社會分歧，更值得深入探究和仔細分析。當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應付、面對、接納、抗拒中國因素時，台灣社會也呈現了它的應對邏輯和反應機制。

參考書目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14。「統計資料：103年1月」（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251879&ctNode=29699&mp=1）。

伊慶春、章英華。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學》，第12期，頁191–232。

陳志柔。2011。「台灣社會分化與兩岸政策」，發表於「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第一次小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4月23日，台北。

陳志柔、于德林。2005。「台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台灣社會學》，第10期，頁95–148。

蔡明璋。2011。「從接觸到接受？婚姻移民支持態度的再檢視」，《研究台灣》，第7期，頁1–23。

楊婉瑩。2006。「性別重組或解組？比較歐美投票性別差距的解釋模式」，《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頁103–31。

楊婉瑩、劉嘉薇。2009。「探討統獨態度的性別差異：和平戰爭與發展利益的觀點」，《選舉研究》，第16卷，第1期，頁37–66。

Espenshade, Thomas J. and Katherine Hempstead.1996. “Contemporary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U.S.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2):535–70.

Ganzeboom, Harry B. G.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3. "Three Internationally Standardised Measure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ccupational Status," in Jürgen H. P. Hoffmeyer-Zlotnik and Christof Wolf (eds), *Advances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 European Working Book for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pp. 159–93.

Kaufmann, Karen M. 2006. "The Gender Gap,"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9(3):447–53.

Kunovich, Robert, M. 2004.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 and Prejudice: An Exploration of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egression Slop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1):20–44.

Norris, Pippa. 2003. "The Gender Gap: Old Challenges, New Approaches," in Susan J. Carroll (ed.),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Questions,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6–70.

Quillian, Lincoln. 1995. "Prejudice as a Response to Perceived Group Threat: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Anti-immigrant and Racial Prejudice in Europ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4):586–611.

Raijman, Rebeca, Moshe Semyonov and Peter Schmidt. 2003. "Do Foreigners Deserve Rights? Determinants of Public Views towards Foreigners in Germany and Israel,"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379–92.

Semyonov, Moshe, Rebeca Raijman and Anastasia Gorodzeisky. 2006. "The Rise of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European Societies, 1988–20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3):426–49.

Semyonov, Moshe, Rebeca Raijman and Anat Yom-Tov. 2002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Perceived Threat, and Endorsement of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oreign Workers in Israel," *Social Problems*, 49(3):416–31.

Thorson, Gregory R. and Stephen J. Stambough. 1994.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the Michigan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tember, New York.